

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学

常建华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历史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史学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研究的面貌。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探讨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为重点,吸收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种理论方法,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质。30 年来,中国社会史学在开拓创新中不断呈现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发展前景。

异军突起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史研究,首先强调的是对于狭义社会生活的研究。马克思所概括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提出生产方式发展史模式,构建了宏观社会历史的理论模式,成为历史研究的“骨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给了我们两点启示:一是人的生活可以指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广义的社会生活,也可以指与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列的狭义的社会生活;二是与生产方式并存的应该还有生活方式,它同样可分为广义的生活方式和狭义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制约着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历史研究重在生产方式研究,对生活方式的探讨则相对缺乏。但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让史学家们认识到,历史研究除了重视“骨架”,还需要补充作为“血肉”的社会生活以及生活方式的内容。于是,社会史学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研究领域。

立足于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进行研究,社会史学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关于社会史的学术定位,有一个从比较考虑研究对象到兼顾研究视角再到重视“问题”的过程。这一过程始终同反省历史学有关。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初兴时,人们往往从研究对象上界定社会史,一般认为社会史是专门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立。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通史,是综合史,属于整体史。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史是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出现的,或表述为新史学、新范式、新视角,其中以“视角”一词的使用较为普遍,强调社会史的革新意义。视角或范式说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影响越来越大。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开始强调“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不断引入新概念、提出新问题,对“国家与社会”、“化内与化外”、“礼仪教化”、“国家认同”、“文化创造”、“女性声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社会史学理论上探讨的不断深入,不仅使社会史研究日益深化,也使历史学更为丰富生动,呈现出新的气象。

硕果累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学在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收获了大量学术成果。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与成果积累,一些对社会史进行整体思考的著作,如《中国社会史概论》、《中国社会史论》、《中国社会通史》等相继出版。在众多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中,以下几个方面引人注目。

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机勃勃。宏观社会形态史往往忽略历史的地理空间因素,而社会史学者大多认为区域是认识历史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区域史研究更具可操作性与实际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强调区域社会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中古史领域,敦煌学一枝独秀,在区域社会文化的研究中独领风骚。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生机勃勃:华南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特色标新立异,华北研究老树新花挑战传统,江南研究继往开来寻求新的突破,徽学研究从商人到宗族再到徽文化不断出新,两湖地区近年来研究成果突出。东北、西北、西南的区域史研究伴随着国家开发与现代化建设不断加强,又与民族史、边疆史结合,自成特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城市社会史研究普遍受到重视,其中几大直辖市、古都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的研究日益深入。乡村社会史在加强“三农”问题研究的刺激下持续进行。受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研究村落社区成为新的学术风气。

社会生活史研究成果丰硕。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一系列断代社会生活史,论述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婚姻史

研究虽然开展较早,但以往的研究相对集中在礼法方面的论述上,缺乏对社会实态的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史研究改变了这种状况。家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并有突破性进展。家族、宗族的研究成果厚重,理论突破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社会风尚与民间信仰是进入民众生活世界与观念形态的重要领域,也是实践历史人类学的好场所,在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视。民间宗教信仰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民俗与风尚方面也有高水平的专著问世。另外,像灾荒、救济与慈善事业的历史研究也受到普遍关注。

社会史与文化史融合已成趋势。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到改革开放之前,以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为标志的宏观社会史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对于文化生活则有所忽视。改革开放后,社会文化研究兴起,预示着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经济史向社会文化史转移,由过分重视经济变为经济与文化并重,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进而发现文化的能动作用,将文化作为独立形态进行研究。近年来的“新文化史”,因其关注民众,重视下层历史,将人的观念、心态、情感纳入研究视野,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可以说,当历史研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就会别开生面。社会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的学术潮流。

跨学科研究催生众多学术成果。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已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共识。目前影响社会史最大的应该算人类学了,甚至可以说社会史发生了人类学的转向。社会史重在研究社会生活,与历史人类学有着不解之缘。一些学者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此外,多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引人注目。融合疾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医疗社会史属于新的学术领域,虽然起步较晚、研究者较少,但研究起点很高,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探讨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在增加。

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地理学与社会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新发展起来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往往包含着社会内容,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发生了“社会转向”。

发展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丰硕,展现出社会史研究的魅力与前途。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国家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力支持有关。现在,社会史学已经成为我国专门的学术领域或曰学科。经过学术争鸣,形成了中国社会史理论的基本概念体系,学者们对学科对象、规范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学科建设颇具规模。中国社会史的教学、研究已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高校历史学以及社会学专业都开设了中国社会史方面的课程,出版了有关教材。若干大学成立了中国社会史方面的研究中心或研究室。今后,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史学只要继续保持开拓创新的意识,应当会有更长足的进步。

学术理念更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学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学术理念的更新,而学术理念的更新与多元学术视野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更新观念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仍是社会史学者努力的目标。只有不断培养新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进行学术创新。

以人为本的学术关怀。关注生命,把人的活动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才能拥有更多的读者,使研究长盛不衰。心态史、医疗社会史以及礼俗研究、日常生活研究、民间信仰与社会风尚研究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它们贴近民众。社会史学应保持自己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这是社会史学的魅力所在。

多元而又高度整合的研究取向。中国史学有对“大历史”的偏好。从社会生活切入以反映时代变迁,通过日常生活的研究来展示人类社会的演变,这是社会史对于书写“大历史”的独特贡献。因此,社会史学在重视社会下层、强调社会文化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经济与国家,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不但要重视个案研究,也要提倡综合研究,努力开辟社会史学的新境界。

一。一个社会的伦理水平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企业决策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必然会因为价值提升的社会期望发生冲突,从而产生更多的伦理摩擦。

企业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强伦理建设。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因为忽视伦理建设而导致企业最终严重受损的事例表明,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不但应遵守法律这一“最起码的行为规范”,而且还必须重视企业伦理建设,遵守那些虽未成为法律条文却为社会成员所期望的行为规范。重视企业伦理建设,从企业角度讲,就是要提高企业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问题决策水平。在很多情况下,伦理问题的是非对错并不像法律问题那么清晰,对伦理问题的决策时常会影响到多方利益,如何取舍常使决策者陷入道德困境。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提高伦理意识和伦理问题决策水平,对企业的相关决策进行伦理审视和评估。从社会角度讲,要推动形成崇尚企业伦理的社会环境。应发挥舆论的监督 and 导向作用,形成以崇尚伦理为荣、违反伦理为耻的舆论氛围,同时建立与企业利益挂钩的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进行评价。

观点



图为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地戎人豪华墓葬出土的制作精美的“金箔虎”、“大角羊”车乘装饰品。有关专家认为,马家塬战国墓地是史书中记载很少的战国晚期戎人首领及贵族墓葬,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新华社记者 王艳明摄

本版责任编辑:卫 庶 叶 帆
电子邮箱:lilunbu@peopledaily.com.cn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与会者紧密结合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七大,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与会者强调,我们党要始终站在时代前

列,一刻也不能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一刻也不能放松理论武装。只有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拓前进。

与会者指出,30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表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法宝。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改革开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旧的理念出发,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然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江西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论坛”近日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与会者围绕“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回顾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党理论创新的进程,认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系统总结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目标、方式、战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

与会者认为,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具体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有学者强调,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列宁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实现了社会主义由建立到建设的过程。

学术交流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之际,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徐继畲及其开放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与会者围绕徐继畲的生平与开放思想、如何看待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认为,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开放意识的人物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新审视徐继畲的开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徐继

畲开放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相关,更与其早年博学多闻、后来在福建等沿海省份与西方人广泛接触密切相关。徐继畲思想开放的程度大大超越了同时代的官僚和其他思想家,是最早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国人之一。

与会者对徐继畲的生平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其在某些任职期间的作为进行了评价。一些学者对徐继畲撰著的《瀛环志略》进行了讨论,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最早借鉴西方文化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打破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在当时具有开辟性意义。

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与辽宁省驾驭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驾驭理论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为方向,对驾驭理论的体系构建、理论来源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驾驭理论研究应以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为方向,围绕驾驭什么和如何驾驭这两个基本问题构建理论体系。具体来说,驾驭理论的基本要素包括驾驭内容、驾驭原则、驾驭方法等。应

不断提高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从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等不同角度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深入研究,并借鉴相关学科的成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与会者强调,驾驭理论研究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思想成果。一是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相关思想;二是研究和阐述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相关思想与经验;三是批判吸收西

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合理成分;四是批判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相关思想的精华。